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 之模式驗證：以學習障礙學生為例

吳秉叡

新竹縣立
忠孝國民中學

余民寧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辛怡葳

苗栗縣立
大倫國民中學

摘要

本研究根據理論與相關研究提出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模型，該模型假設個體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會透過「提升式希望感」進而影響個體的「復原力」。因此，研究者係針對臺灣地區 38 所公立國中共 434 位學習障礙學生進行調查，並進行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來評鑑蒐集的資料是否適配本研究所提出之理論模型。研究發現研究者所建構之理論模型得到驗證與支持，顯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會透過提升式希望感的作用，對復原力產生影響。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字：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復原力、提升式希望感、學習障礙學生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傳統上，心理學常將焦點集中於探索個體之內在痛苦或缺陷，近年來，已轉為關注於優勢能力以及內在療癒，著重於「健康的催化」與「潛能的開發」(Seligman, 1995, 1998)。在正向心理學的思潮之下，Luthans、Luthans 與 Luthans (2004)提出「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一詞，定義心理資本為個體在發展某成果的過程中所表現的正向心理狀態或心理資源，能透過投資和開發使個體獲得競爭優勢。另外，Luthans、Youssef 與 Avolio (2007)強調心理資本是個體內在的核心要素，重要性遠超過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Luthans 與 Youssef (2007)也進一步指出擁有高心理資本的個體具有責任感與自信心，即使事情變得棘手，亦能持續尋找其他出路，若有失意之時，高心理資本者也能快速跳脫困境，再一次激發潛能，維持蓄勢待發狀態。

Luthans、Avolio、Avey 與 Norman (2007)認為心理資本係由四個面向構成，包括：(1)自我效能感：個體擁有自信心，能在面對挑戰性任務時，透過努力而獲得成功；(2)樂觀：個體對現在或未來的成功具有正向的意念；(3)希望感：個體能朝目標前進，必要時也能調整目標以獲取成功；(4)復原力：個體處於逆境時，能堅持下去、超越現況而獲致成功。而依據 Bandura (1977)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理論指出兩個期望，一種是「對結果的期望」(outcome expectancies)，亦即個體是否相信

其特定的行為將導致特定的結果；另一種是「對效能的期望」(efficacy expectancies)，亦即個體是否有自信能達到期望的結果。其中「對結果的期望」類似於徑路思維希望，「對效能的期望」則類似於意志思維希望(Snyder, 1995)，可知自我效能感應可納入希望感的鉅觀概念之中。

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ies, LD)為特殊教育法所歸類的身心障礙十三類別之一，目前為臺灣地區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出現率頗高的一類，多安置在普通班，而部分時間至輔導室資源教室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包含國文、英語、數學或社交技巧等課程內容。學習障礙統稱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問題，以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另外，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2)。進入青少年時期後，孩子的一般發展原本便與兒童時期很不一樣，且國中階段各方面似不若小學強調以學生為本位，由於升學需要，有一定比例的重心必須強調以課程內容為導向，普通班大班教學方法也不見得適合其優勢能力與興趣(Blackorby & Wagner, 1997)。學習障礙學生面臨障礙帶來的「學業挫折」，又與「青少年特質」交互影響，有可能帶來負面效應，如低自尊、低動機，進一步造成人際互動或行為問題(Dohrn & Bryan, 1998; Lerner, 2003)。

一般而言，個體的自我價值感會隨著持續的挫折而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學業方面，學習障礙學生雖然經歷持續的

挫折，卻並非每位學習障礙學生都擁有較低的自尊，有些學習障礙學生因為具有「樂觀態度」與「復原力」，縱使遭遇挫折，亦不影響其自信與自我價值感(Keogh, 2000; Luther, Cicchetti, & Becker, 2000)。而對發展而言，學習障礙雖然是個危險因子，可能削減自信、努力不懈的效能，但仍有許多學習障礙學生表現在水平以上。Lerner (2003)指出許多成功的學習障礙人士身上，皆可發現「復原力」的特質——雖然經歷學業挫折或同儕拒絕，卻仍能維持高度的自我價值感、樂觀態度與希望感，堅信自己能跨越逆境與困難，獲致不錯成果。這些學習障礙學生的高度自我效能感及成功歷程令人鼓舞(Brown & Gerber, 1994)。

許多學者曾著眼於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面向來提出「危險及復原力架構」，包括自我瞭解、自尊(Cosden, Brown, & Elliott, 2002)、友誼模式(Wiener, 2003)、孤獨感(Margalit & Al-Yagon, 2002)。Cosden 等(2002)認為運用危險及復原力架構做研究能說明學習障礙學生的個別差異，亦能鑑別正向、負向結果的相關因素，進而將研究焦點置於探討學習障礙學生正向心理於多元智慧的「優勢本位群體內分析」(strength based within-group method of analysis)，而非侷限於學業困難補救教學的「群體間缺陷導向模式研究」(deficit-oriented between-group model study)。

Wong (2003)曾提出隨著危險及復原力架構而起的幾項爭議，包括：(1)如何統整現今研究與早期 Werner (1993a, 1993b) 及 Werner 與 Smith (1982, 1992, 2001)之縱貫性研究，以及 1980 至 1990 年代學習障礙學生之社會覺察與溝通研究；(2)測量

(measurement)問題；(3)學習障礙程度、性別的研究有需要更具區別性；(4)應持續探究學習障礙潛在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5)危險或保護因子形成的過程或方式值得研究；(6)實際療育的研究本質為何。Wong 也進一步針對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議題提出危機與復原力架構，強調日後研究應以「復原力」為主軸，可深究學習障礙學生特有的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以找出學習障礙學生具有個別性之保護機制。Bryan (2003)、Cosden (2003)、Margalit (2003)與 Wiener (2003)等人回應 Wong 的論點，贊同探究學習障礙學生的發展，將有助於理解個體正向與負向的發展模式。

傳統研究大多注重於學習障礙學生的缺陷障礙特質及低落學科的補救教學，因此，本研究欲由另一角度著眼，依據正向心理資本觀點，將正向心理資本內涵加以歸納、縮減為三個構念，包括「樂觀解釋風格」、「希望感」與「復原力」，並以復原力為主軸，視個體正向心理資本為保護因子，個體學習障礙特質則為危險因子。研究者再依據其他研究者的建議以學習障礙學生為樣本(駱月娟、黃曬莉、林以正、黃光國，2010；Park & Helgeson, 2006)，欲探討學習障礙學生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試圖瞭解與建構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的互動關係之理論模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望能在實務面上，瞭解影響學習障礙學生復原力之保護因子以提出建議給輔導工作者與特殊教育教師參考；而在學術面上，期望能針對解釋風格、希望感與復原力之理論建構提供實徵性證據。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有二：

1. 瞭解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現況。
2. 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中介模型理論架構。

貳、文獻探討

迄今對於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仍尚無公認一致的分法，因此進行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定義與內涵之探討，以及闡述學習障礙學生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理論模型之建構。

一、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定義與內涵

解釋風格(explanatory style)，或稱為歸因風格(attributional style)，是一種個體對於解釋事件習慣方式的認知特徵(Peterson & Seligman, 1984; Pintrich & Schunk, 2002)，其概念起源係基於 Seligman 於 1960 年代時進行的「習得無助感」(learning helplessness)研究，係指「在面對涉及自我的正向事件與負向事件結果，提出習慣性解釋的個人傾向」(Peterson, Buchanan, & Seligman, 1995)。而解釋風格主要係涉及以下三種向度，包括(1)「內在化」(我)對「外在化」(其他人)、(2)「一般性」(它影響我生活的許多層面)對「特定性」(它只影響我生活的一個層面)、(3)「永久性」(持續很久)對「暫時性」(暫時的)(Ho, Chu, & Yiu, 2008)。

Abramson、Seligman 與 Teasdale (1978) 指出習得無助感研究結果的應用在推論上遭遇兩個問題：其一為並沒有辦法解釋同

處於無法控制的情境中，為何卻只有某些人會產生習得無助的情形；其二則是無法解釋習得無助感何時具普遍性、何時具特定性、何時具長期性以及何時具短暫性。Seligman、Abramson、Simmel 與 von Baeyer (1979)認為個體覺知行為與結果無關的預期(expectancy of response-outcome independence)，並不一定會形成無助感，而是當個人無法控制事件失敗原因歸因於內在化、永久性與一般性的因素時，才會容易形成習得無助感的產生。而樂觀與悲觀的觀點逐漸顯示出人們慣性思考生活事件「成因」的角度，譬如當人們歸納自己所犯的問題是外在化、暫時性與特定性的成因，而非內在化、永久性與一般性的成因時，會較傾向於樂觀解釋風格。

Seligman、Reivich、Jaycox 與 Gillham 曾於 1995 年指出解釋風格理論往往被視為是一個樂觀模式，將一個樂觀的人界定為傾向把負向事件成因視為是外在化、暫時性與特定性的成因(引自 Ho et al., 2008)。Mezulis、Abramson、Hyde 與 Hankin (2004)研究也指出「自利歸因謬誤」(self-serving attributional bias)會使個體對於正向事件比負向事件更傾向於做內在、永久與一般性的歸因。因此，樂觀解釋風格被視為擁有自利歸因謬誤，傾向以外在的、不穩定的和特定的原因來解釋負向事件，或是用內在的、穩定的和整體的原因來解釋正向事件，並被研究證實樂觀解釋風格者擁有較少的精神病症狀(Jolley et al., 2006)。

但是需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卻往往有些負向思考反而具備正向的能量。一般而言，樂觀往往會帶來正向的結果，而

悲觀會帶來負向的結果，但防衛型悲觀 (defense pessimism) 則是一種反例，因為其特徵是負向的預期想法與負向情緒卻產生正向的結果，透過悲觀與焦慮轉化成具建設性的能量，避開可能遭遇之困境，進而提高信心，感覺比較能夠控制情況，而提高成功的機會 (李政賢譯，2011)。另外，研究也指出樂觀必須符合現實，才有可能發揮正向的效應 (Schneider, 2001)，因此務實樂觀與不務實樂觀之區別，以及評估個體處境的現實狀況，也會導致樂觀產生正向或負向的效應及影響程度。可知從防衛型悲觀與不務實樂觀之研究結論，確實顛覆了「樂觀一定導致正向結果，悲觀則一定導致負向結果」的傳統二分結論。

因此，樂觀解釋風格可能會促使個體相信自己的行為會影響結果，即使不好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也是偶然的，能在較短時間內擺脫沮喪的情緒；相反的，悲觀解釋風格可能會促使個體相信自己是無助的，無論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成功，並且認為不好事件會重複發生在自己身上，造成行為動機大幅降低 (Cropley & MacLeod, 2003; Peterson & Park, 1998)。而悲觀解釋風格係指傾向用內在化、穩定性和一般性的原因來解釋負向事件，或是用外在化、暫時性和特定性的原因來解釋正向事件 (Kamen & Seligman, 1987)。

Peterson 等 (1982) 曾編擬「歸因風格問卷」 (The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後續 Peterson 與 Villanova (1988) 亦編擬出「擴充版歸因風格問卷」 (the Expanded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EASQ)。樂觀解釋風格原始模型似乎只涉及人們對於負向事件的反應方式 (Seligman

et al., 1984)，而 EASQ 也沒有測量面對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但若是僅僅根據個體對負向事件時的解釋方式來定義樂觀，似乎並不太適當 (Norem & Chang, 1997; Peterson, 2000; Snyder, 1995)，因為樂觀解釋風格應該是人們預期未來會有好的事情，所以可以預測未來會有正向的結果以提高其適應能力，因此當評估解釋風格時，可能需要考量將正向事件納入方程式當中 (Park & Helgeson, 2006)。

Bunce 與 Peterson (1997) 也指出在習得無助感的理論中，並沒有針對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提出理論上的價值，絕大多數實徵研究均僅關心個體對負向事件的解釋。此外，研究也指出在一個重要生活事件之後，擁有較高樂觀水準 (被視為對於正向事件有高度期待) 的個體，比起那些擁有較低樂觀水準的個體具有更高的復原力，但是在悲觀水準 (被視為對於負向事件有高度期待) 方面則並沒有相同的結果 (Ho, et al., 2008; Kivimaki et al., 2005)，亦即面對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論點可能會比面對負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論點，能夠發揮出更重要效果與更有價值性。因此，本研究依據上述研究建議，擬將焦點著重於正向事件解釋風格之探討，認為學習障礙學生的解釋風格應考量面對正向事件時解釋風格之探討，才能更準確詮釋解釋風格之內涵。

二、提升式希望感定義與內涵

希望感是個人如何面對生活的一種性格，通常被定義為對某件事或環境充滿期待與慾望 (Elliott, Knight, & Cowley, 1997; Kashdan et al., 2002)。隨著時間改變，希望感變成類似特質的狀態，且基於個體想

達成有價值目標時，所形成對於自我能力的知覺(Snyder, Shorey, & Berg, 2004)。希望感是一種認知思考模式，既是跨越情境的狀態，也是一種類似特質的概念，在特定情境之下個體會出現達成目標的知覺能力，以及產生方法來達成目標(Snyder, 2002)。

Shang (1994)也指出人們在表達個體的希望時，有些人將希望視為一種認知或想法，有些人則從情感角度來解釋，也有些人認為希望是行為的動機。Snyder 等(1991)擴大了 Stotland 將希望感視為認知架構之觀點，加入目標導向概念，將研究重心從傳統的「動機」轉為「希望」，並指出不論是兒童或成人的希望感，均是目標導向的認知過程。黃致達(2008)將 Snyder 的希望感理論定義為：個體為立下目標，並斟酌自身「是否能達成該目標」的意志認知思維，以及覺察自身是否有能力「尋求途徑達成目標」的一種認知思維，由這兩種認知思維交互作用，產生的心理認知機制，即稱為「希望感」。

希望感可增進兒童對自我及未來的樂觀，促進其邁向所欲結果的具體行動(Hagen, Myers, & Mackintosh, 2005)。希望感理論中的目標思維、意志思維和徑路思維，三者間的互動關係環環相扣且極為緊密。希望感的三個要素內涵，分別為(1)「目標思維」(goal thinking)：能夠規劃出清楚目標的能力；(2)「意志思維」(agency thinking)：自信自己有能力理解情況或達成目標，是一種心理層面的正向動機信念之能量與信心，能引導個體不斷前進以達成目標；(3)「徑路思維」(pathways thinking)：達成目標(由所在地 A 到目的地 B)的積

極策略或能力，亦即有信心可以找到達成理想目標的途徑，若遭遇障礙，也可以找到突破障礙的其他替代出路(Lopez, Snyder, & Pedrotti, 2003; Snyder, 1994)。而希望感之提升，必須要能同時具有充足的意志思維與清楚的徑路思維兩部分才有可能(Westburg, 2003)，亦即方法途徑和意志力並非兩個分割獨立的領域，兩者應該是密不可分且缺一不可的交互作用，因此學者曾將希望感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來輔以說明，亦即「希望感=意志力+方法途徑」(Hope = Agency + Pathways)(Snyder, 2000)。

駱月娟等(2010)從華人本土心理學觀點，反思說明東方文化中的希望感則較強調以失敗與困頓之後所產生的柔性堅持力量，稱之為「寧靜盼望」；而 Snyder 等(1991)所提出強調正向成功感受之希望感，涉及以未來成功想像來激勵個體意志力與解決途徑，稱之為「提升式盼望」。據此可知，「提升式希望感」此一名詞相較於傳統所謂的「希望感」一詞，似乎更能明確地表達出面對正向事件時的積極希望層面。因此本研究主要採取 Snyder 等(1997)強調西方特質論的意志與徑路特質之提升式希望感面向，視學習障礙學生提升式希望感為依據情境與領域不同，具有領域特定的特質狀態，嘗試進一步深入學習障礙學生面對正向事件時其提升式希望感之探討，以更瞭解學習障礙學生的提升式希望感之內涵與影響因素。

三、復原力定義與內涵

復原力係指即使經歷重大逆境，嚴重威脅到個體的發展，個體卻能夠維持正向適應的現象(Luther et al., 2000)。Bonanno (2004)指出在臨床心理學當中，傾向凸顯

短期的「復原力」反應，在發展心理學當中則強調長期「復原」(recovery)反應，而「復原力」與「復原」之間是兩種各自殊異的反應型態。復原力涉及個體常態身心機能之混亂，時間不會超過數個星期，在混亂之後會回復到相對平穩而健全的身心機能水準，亦即復原力的特徵是在相對短期的時間內，就從負向經驗彈跳回來（李政賢譯，2011）。

復原力是多方面的能力，能使個人、團體或社會預防、減低或克服逆境可能導致的負面結果(Grotberg, 1995)，也就是Masten (2001)所稱「平凡人的神奇力量」(ordinary magic)。復原力的定義會隨生命階段而調整，因為復原力是危險因子與個人因子、家庭因子或環境的保護因子相互影響以達到適應平衡的動態過程(Tusai & Dyer, 2004)。目前針對復原力的影響因素多採取雙因子論點，亦即視復原力為「危險因子」(risk factor)與「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之間交互作用的動態歷程。

在危險因子方面，Keogh 與 Weisner (1993)將危險因子視為阻礙或威脅孩子正常發展的負面或潛在負面狀況，Spekman、Herman 與 Vogel (1993)則認為危險因子即具有危害性的情況，足以提高負面結果的出現率，這些因子包含個人本身的內在特質與家庭、學校及社區環境等外在特性，而高危險群孩子通常長期受到不只一項危險因子的影響(Morrison & Cosden, 1997; Wiener, 2003)。而危險因子的個人特質包括許多內隱成分，包括：(1)先天易受傷性(constitutional vulnerability)：包括心理及生理健康相關問題，而生

理缺陷如先天的障礙或感官缺陷（如肢體障礙、學習障礙、聽覺障礙）亦有可能影響心理適應；(2)早期行為表現：如容易羞怯、情緒處理不佳、人際困難、自我中心、無法適當表達自己、低自尊、過動、缺乏自信等；(3)負面經驗造成的挫折感或疏離：如失敗感、絕望感、憂鬱、自殺、難以與他人正面積極互動或建立親密關係、易受負面同儕壓力影響等。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每個危險因子都會對個人產生負面結果。Werner (1993b)曾在夏威夷考艾島(Kauai island)進行長達32年的縱貫性研究，研究島上出生的660名嬰兒的發展，其中約有兩百多名嬰兒承受多重危險因子，如生產前後問題、家庭社經地位不佳、教育水準低落、父母精神性或遺傳性疾病、家庭情感功能不彰等，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多重危險因子似乎可預測之後的不良發展，卻仍有三分之一的兒童並未出現負面影響，亦即身心發展健全。因此，危險因子並「不一定」會對個體產生負面影響，許多因素間複雜的互動都可能影響最終適應結果。

在保護因子方面，Christle、Jolivet 與 Nelson (2000)指出復原力為內在保護因子（個人）與外在保護因子（家庭、學校、社區）的作用，使人在逆境中仍保有精神與力量的回復能力。Dyer 與 McGuinness (1996)亦指出復原力是高度受保護因子影響的動態過程，能協助人們從挫折中恢復並持續原本的生活。

Grotberg (1995, 2001)認為復原力的保護因子並非自行發展，必須仰賴家長、老師等成人的教導及協助，且其來源可歸納為三項：「外在支持和資源」、「個人內在

的力量」與「社交及人際技巧」，可分別以「我有」(I have)、「我是」(I am)與「我能」(I can)的概念來代表。其中，屬於個人內在的力量(我是)，包括感覺、態度與信念，可更細分為自尊、希望、勇敢、同理心、被愛感、成就取向、內控能力等；至於社交及人際技巧(我能)主要則是經由與人互動學習而來的技巧，如幽默、溝通、思考、創造力、問題解決、衝動控制、社交與因應技巧。這些保護因子可能是個體天生擁有這些特質，亦可能經由後天學習得來。

因此，復原力是會隨個人的身心發展階段而調整，其定義係隨生命階段而調整，亦即復原力是危險因子與個人因子、家庭因子或環境的保護因子相互影響以達到適應平衡的動態過程(Tusai & Dyer, 2004)。綜合上述，復原力的重要內涵應該涉及個體的個人內在力量與社交人際技巧，包括面對挑戰、情緒調適與精神意念等向度皆是構成個體復原力的重要因素。

四、學習障礙學生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模型建構

復原力內涵之探討，需考量不同的研究對象屬性及其所屬發展階段而有所調整(Grotberg, 1995; Tusai & Dyer, 2004)。Spekman、Goldberg與Herman(1993)指出學習障礙學生常會因「學習障礙」所衍生的負向發展結果而置身危險情境，例如因為低自尊或缺乏社交技巧而遭遇同儕排擠甚至霸凌等，而這些危險情境更是影響學習障礙學生未來成人生活適應的「危險因子」。而「學習障礙」本身即是一種危險因子，一個伴隨「學習障礙」的個體，等同

於處於危險情境下的高危險群個體(Miller, 2002; Wiener, 2003)。

Miller與Fritz(1998)指出「重建」(reframe)學習障礙經驗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改造歷程，希望學習障礙學生能用更有建設性且正向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學習障礙」所導致的生命經驗；這種內在認知觀點的改變到外在行為反應的變動歷程，更是學習障礙學生建構「復原力」的重要機制。而學習障礙也會結合其他因素(努力、堅持、自我覺察等)，對個體生活適應造成影響，因此不能只用單純的障礙因素來預測個體的適應結果，復原力需同時著重學習障礙學生外在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所產生複雜交互作用之關聯(Margalit, 2003; Meltzer et al., 2004; Morrison & Cosden, 1997)。

樂觀有助於個體產生正向的經驗，包括認知、情緒與動機的成分，樂觀的個體有較好的心情、較高的挫折容忍力，且有較佳的生理健康(Peterson & Steen, 2002)。相反的，憂鬱症狀可能會隨著悲觀解釋風格而日漸增加(Golin, Sweeney, & Schaeffer, 1981; Seligman et al., 1988)。樂觀解釋風格與較佳的復原力相關，即使遭遇負面回饋亦能預期較佳表現(Seligman, Nolen-Hoeksema, Thornton, & Thornton, 1990)。

悲觀解釋風格者因為覺得正向事件則是偶然發生的，負向事件則會在不同時間與場合持續發生，傾向認為未來是「難以控制」的，因此對於改變未來是無望的，具備較低的希望感，因而面對挑戰時也很消極(Kamen & Seligman, 1987)，而且悲觀解釋風格的人可能因為「順其自然」(whatever will be)，因而容易忽視其生理或

心理健康(Peterson, 1988)，同時也是憂鬱症的高危險群(Seligman et al., 1979)。

希望感與勇氣及樂觀等正向積極的心態，是很重要的內在心理能量，可用來保護人們免於罹患心理疾病(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研究也發現高危險群兒童的希望感也和沮喪症狀具有負相關(Stark & Boswell, 2001)。高度希望感個體擁有較佳的心理調適能力(Kwon, 2002)，在面對壓力情境時，希望感較高的個體之壓力容忍力較高，也有較佳的因應策略。身體的恢復力較強，且較不會有工作的倦怠感；相反的，希望感較低的個體對於壓力的容忍力較弱，也較常會逃避壓力，較不會照顧自己，也容易感到疲倦，一旦受到傷害就會感到沮喪且不容易恢復(Snyder, 1994)。Snyder 等(2004)認為唯有厚植希望感，才能幫助個體與遇到逆境時產生的憂鬱抗衡。

Sorensen 等(2003)針對學習障礙學生日益增多的社會心理調適問題做兩年的縱貫性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內外保護因子對於學生的課業技巧僅有小幅改善，但卻對心理社會結果有正向影響，因此對學習障礙學生來說雖然學業困難持續存在，但周遭環境與保護因子對其心理社會調適之復原力的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樂觀解釋風格被視為擁有「自利偏誤」(self-serving bias)，傾向以內在的、穩定的和整體的原因來解釋正向事件，被證實擁有較少的精神病症狀(Jolley et al., 2006)，也與較高動機、生理幸福感與較少沮喪症狀相關(Buchanan, 1995)；悲觀解釋風格則相信正面事件是由於外在、不穩定、特定的成因導致，這種悲觀解釋風格可能引起

「無希望感」(hopelessness)，連帶造成許多無希望感的沮喪症狀(Abramson, Alloy, & Metalsky, 1995; Lakdawalla, Hankin, & Mermelstein, 2007)。據此，綜合上述的理論與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提升式希望感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的影響之間扮演著中介變項的角色，直接或間接影響個體復原力效能之展現。

參、研究方法

分別就研究設計及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與分析加以說明。

一、研究設計

依據文獻歸納與整理後，除了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可能直接影響復原力之外，提升式希望感也可能是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間的中介變項，包括兩種可能的中介模型，第一種是「部分中介」模型，在此模型中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會直接影響復原力，也會透過提升式希望感間接影響復原力；第二種是「完全中介」模型，在此模型中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並不直接影響復原力，而只是透過提升式希望感來間接影響復原力。因此，本研究提出三種不同的模型，如圖 1 所示，目的在檢驗提升式希望感是否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扮演著中介角色。

二、研究對象

(一) 預試樣本

本研究囿於學習障礙學生樣本抽取與施測不易，因此預試調查樣本以普通學生為對象，正式調查樣本則以學習障礙學生為對象。預試抽樣方式為立意抽取新竹縣五所公立國民中學，以班級為抽取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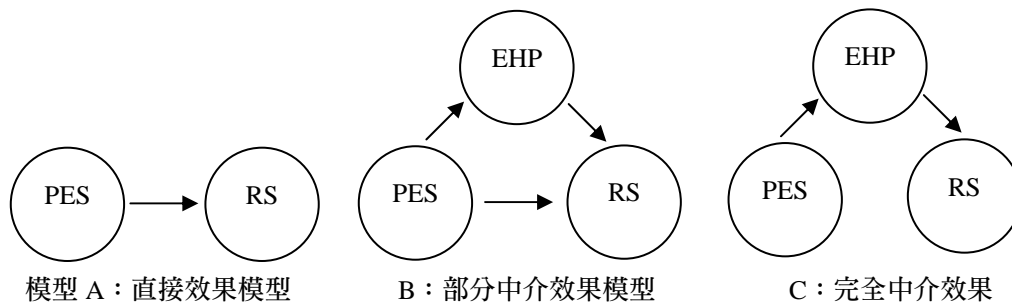


圖 1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理論的三個假設模型。

註：PES 表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EHP 表示提升式希望感；RS 表示復原力。

每所學校選取七、八、九年級各一班，總計抽取 15 班普通學生共計 431 人。除採取整列剔除法(listwise)刪除內容填答不完整（如題目中有一題以上未答或漏答），以及具有明顯反應心向（如題目傾向全部勾選某一數字或循環式 S 型作答）之無效問卷，此外對於普通班級內特殊學生填答之間卷亦予以剔除，預試問卷有效樣本共計 394 人，樣本有效回收率為 91.42%。

（二）正式樣本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各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學習障礙之學生為研究對象，為使正式調查樣本具有代表性，本研究正式問卷的研究樣本，係依據臺灣地區北部（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宜蘭縣）、中部（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南部（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公立國民中學學習障礙學生之人數比例進行縣市地區分層，再依照設有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及巡迴資源班的學校為隨機抽樣叢集，選取該校全部學習障礙學生進行研究調查，各

校學習障礙學生人數介於 5 人至 31 人之間。

施測期間委請各校特殊教育教師針對識字或閱讀理解困難之學習障礙學生輔以口頭報讀與解釋題意之服務，藉由國中學生生活經驗調查為名，以無具名方式進行填寫，總共抽取 38 所學校共計 480 位學習障礙學生作為正式調查樣本，剔除無效問卷後，最終正式問卷有效樣本共計 434 人，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0.42%。其中北部學生有 174 人（佔 40%），中部學生有 129 人（佔 30%），南部學生有 131 人（佔 30%），採用卡方適合度檢定正式施測階段的學習障礙學生樣本與母群體各區人數的百分比未達顯著差異，如表 1 所示。

至於正式施測樣本背景變項資料之分析，在性別方面，男生有 324 人（佔 75%），女生有 110 人（佔 25%）；在年級方面，七年級學生有 104 人（佔 24%），八年級學生有 167 人（佔 38%），九年級學生有 163 人（佔 38%）；在特殊教育服務方面，接受資源班服務學生有 405 人（佔 93%），未接受資源班服務學生有 29 人（佔 7%）；

表 1

母群體與正式施測樣本各區人數百分比一致性之檢定

區域	母群體各區人數與百分比	樣本各區人數與百分比	χ^2	df	p 值
北部	3,006 人 (39%)	174 人 (40%)	.66	2	.720
中部	2,187 人 (29%)	129 人 (30%)			
南部	2,452 人 (32%)	131 人 (30%)			
總計	7,645 人(100%)	434 人(100%)			

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有 34 人（佔 8%），中家庭社經地位學生有 101 人（佔 23%），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有 299 人（佔 69%）。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量表主要有三個部分，分別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正向事件解釋風格

關於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的測量，係參考高民凱(2001)的「中學生解釋風格量表」與 Peterson 等(1982)的「解釋風格歸因問卷」(ASQ)等研究工具，以「正向事件個別性」、「正向事件恆久性」與「正向事件普遍性」三個層面共 10 題進行測量。在「個別性」分量表中，正面事件的題目包括「玩遊戲贏了」、「跑步比賽贏了」；而在「恆久性」分量表中，正面事件的題目包括「受到朋友讚美」、「領到一張獎狀」、「同學請我吃糖果」、「零用錢增加」；至於「普遍性」分量表中，正面事件的題目包括「畢業時有人送花給我」、「朋友變得比較多」、「心情突然變好」、「最近身體很健康」。

填答方式採 Likert 四點量表之型式，其中「個別性」向度得分越高，表示對正

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越傾向於內在化（歸因於個體因素），得分越低則表示解釋風格越傾向於外在化（歸因於環境因素，如運氣、機會或命運）；「恆久性」向度得分越高，代表對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越傾向於穩定性（歸因於長久或定期持續重複發生的因素），得分越低則表示解釋風格越傾向於暫時性（歸因於短暫或斷續發生的因素）；「普遍性」向度得分越高，表示對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越傾向於一般性（歸因於跨情境的因素），得分越低則表示解釋風格越傾向於特定性（歸因於只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會出現的因素）(Peterson et al., 1984; Seligman, 1998)，因此，三個基本分量表整體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於樂觀解釋風格。經預試樣本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編製出正式量表 10 題，其中包括正向事件個別性、正向事件恆久性與正向事件普遍性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依序為 .78、.75、.76，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72，顯示量表在測量上具有不錯的穩定性。

（二）提升式希望感

關於提升式希望感的測量，係參考敬世龍(2010)的「中學生希望感量表」與 Snyder 等(1997)的「兒童希望感量表」(The

Children's Hope Scale, CHS)等研究工具，以「意志思維希望」、「徑路思維希望」兩個層面共八題進行測量。在「意志思維希望」分量表中，題目包括「我充滿活力地追求我的目標」、「過去的美好經驗讓我對未來做好萬全準備」、「我覺得目前的生活相當成功」、「我能夠達到自己所設定的目標」；而在「徑路思維希望」分量表中，題目包括「任何問題都有許多解決的方法」、「我可以想到許多方法獲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即使當大家都氣餒時，我知道我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我會想許多方法來讓大家可以一起開心過生活」。

填答方式採 Likert 四點量表之型式，其中「意志思維希望」向度得分越高，表示其意志思維希望感越高，反之則較傾向於越低的意志思維希望感；「徑路思維希望」向度得分越高，表示其徑路思維希望感越高，反之則較傾向於越低的徑路思維希望感。經預試樣本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編製出正式量表八題，其中意志思維希望與徑路思維希望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依序為.70、.66，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77，顯示信度值屬於良好的範圍。

關於復原力的測量，係參考詹雨臻、葉玉珠、彭月茵與葉碧玲(2009)的「青少年復原力量表」以及 Connor 與 Davidson (2003)的「Connor-Davidson 復原力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等研究工具，以「面對挑戰」、「情緒調適」、「精神意念」三個層面共八題進行測量。在「面對挑戰」分量表中，題目包括「別人對我的看法，不會讓我感到充滿壓力」、「我能夠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改變」、「我能夠處理讓我不舒服的感覺」；

而在「情緒調適」分量表中，題目包括「我能夠以幽默方式，來看待很嚴肅的事情」、「面對不確定的狀況，我還是能夠很自在放鬆」；至於在「精神意念」分量表中，題目包括「我覺得事情發生總是有它的理由」、「我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我對自己很有自信」。

填答方式採 Likert 四點量表之型式，復原力各向度與整體得分越高，表示其復原力越高，反之則較傾向於越低復原力。經預試樣本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編製出正式量表八題，其中問題解決、面對挑戰、情緒調適與精神意念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依序為.64、.70、.68，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74，表示量表在測量上具有相當不錯的穩定性。

四、實施流程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係採取「中介模型」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變項之間的關聯性，並試圖建構三個變項之間的理論模型。研究主要以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資料分析與驗證假設，並在驗證研究假設之前，先對測量工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確認潛在變項可以被有效的衡量，待得到良好的測量模型後，再進行結構模型分析(余民寧、鍾珮純、陳柏霖、許嘉家、趙珮晴，2011)。此外，估計中介模型效果之前，必須先估計直接模型效果，假設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將可接著對中介模型進行估計(Hoyle & Smith, 1994)。

因此，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後逐一檢查問卷之填答情形，刪除廢卷、作答不齊以及有明顯反應心向者後，將原始資料予以

編碼登錄於電腦上建立資料檔，再以 SPSS 與 LISREL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與模型適配度考驗。

肆、結果與討論

一、觀察變項常態性檢定與模型估計方法選擇

首先針對樣本資料進行篩檢，檢視蒐集資料是否為常態分配，以作為估計方法的選擇依據，八個測量變項的相關係數、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數值，如表 2 所示。依據 Curran、West 與 Finch 於 1996 年採用蒙地卡羅(Monte Carlo)模擬方法之

研究，認為偏態係數介於 2.00 到 3.00 之間，且峰度係數介於 7.00 至 21.00 之間時，資料可以被認定為具有中等嚴重程度地偏離常態分配；而當偏態係數大於 3.00 以上，且峰度係數大於 21.00 以上時，資料可以被認定為相當地偏離常態分配（引自余民寧，2006，頁 194）。因此由 Curran 等人的標準來看，本研究正式量表中各個觀察變項的偏態係數介於絕對值.06 至.60 之間，峰度係數介於絕對值.00 至.61 之間，因此整體而言並沒有偏態與峰度問題，亦即本研究資料符合常態分配，因此接下來的結構模型分析採取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作為估計參數的方法。

表 2

所有測量變項的相關係數、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變項	X1	X2	X3	Y1	Y2	Y3	Y4	Y5
X1	1							
X2	.16**	1						
X3	.17**	.40**	1					
Y1	.21**	.35**	.26**	1				
Y2	.13**	.27**	.19**	.49**	1			
Y3	.11*	.14**	.17**	.35**	.37**	1		
Y4	.08*	.17**	.14**	.29**	.27**	.42**	1	
Y5	.13**	.19**	.16**	.48**	.43**	.55**	.49**	1
平均數	2.69	2.52	2.49	2.94	2.97	2.87	2.78	3.02
標準差	.72	.62	.58	.60	.61	.61	.73	.62
偏態	-.16	-.06	.22	-.57	-.60	-.33	-.32	-.56
峰度	-.36	-.33	-.14	.61	.34	.17	.00	.33

註：X1－X3 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的測量變項，依序是正向事件個別性、正向事件恆久性、正向事件普遍性；Y1－Y2 為提升式希望感的測量變項，依序是意志思維、徑路思維；Y3－Y5 為復原力的測量變項，依序是面對挑戰、情緒調適、精神意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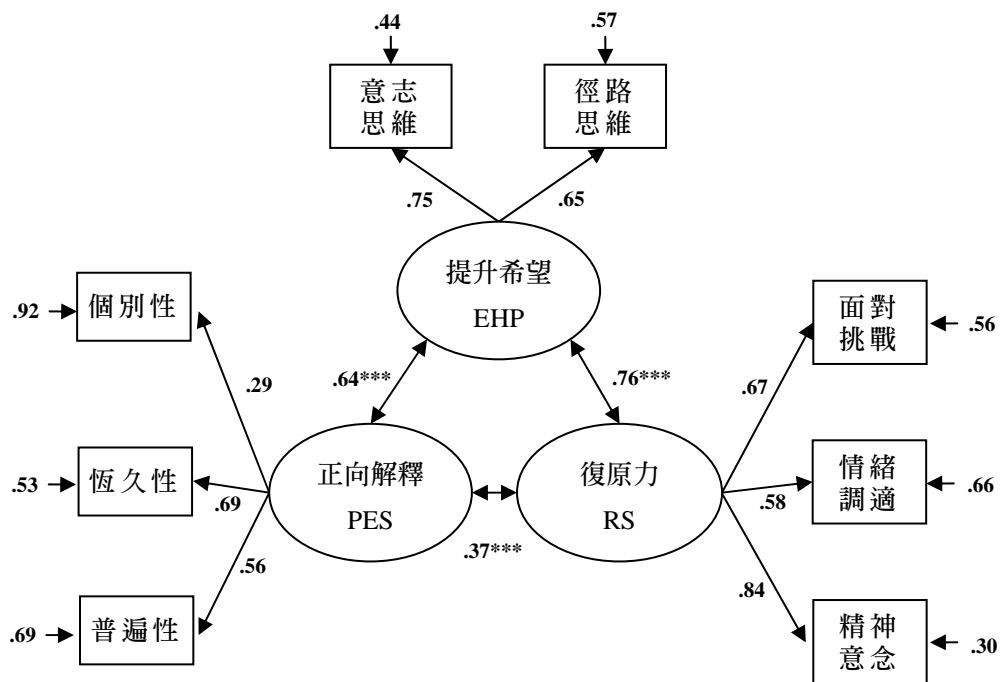
* $p < .05$. ** $p < .01$.

二、測量模型估計結果

在驗證本研究理論模型之前，研究者必須先對本研究測量工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目的在於確認潛在變項能夠被有效的測量。此測量模型有八個測量變項，分別用來推估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等三個潛在變項，而在測量模型中所有潛在變項都被允許和另一個潛在變項相關。本研究使用 LISREL 8.72 版，以最大概似法進行參數估計，分析結果得到良好的適配度， $\chi^2 = 16.83$ ， $df = 17$ ， $RMSEA = .000$ ， $p = .47$ ，顯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達良好適配。

圖 2 為本研究的測量模型圖，此測量模型中八個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除正向

事件個別性稍低之外，其餘因素負荷量介於 .56— .84， t 值則介於 4.86—17.83，均達 .001 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整體問卷題目的測量品質尚稱良好，測量指標有良好的聚斂效度。研究之測量工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與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指標如表 3 所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依序為 .53、.66、.74，大致符合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 建議潛在變項之 CR 值應達到 .60 以上之標準；至於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除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較低外，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的 AVE 值依序為 .49、.50，並未符合 Bagozzi 與



$\chi^2 = 16.83, df = 17, p\text{-value} = .47, RMSEA = .000$

圖 2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測量模型圖 (標準化解)。

表 3
測量模型之信度、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

構念	內部一致性信度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PES)	.72	.53	.29
提升式希望感(EHP)	.77	.66	.49
復原力(RS)	.74	.74	.50

Yi (1988)建議潛在變項之 AVE 值宜超過.50 之標準，顯示雖然試題並未能完全有效反應潛在變項，這些試題僅足以測得 29%到 50%所建構的變異量，表示此模型的內在品質未臻理想。

此外，本研究三個潛在變項彼此間都有顯著相關，相關係數的絕對值介於.37— .76，*t* 值的絕對值則介於 5.57—16.80，均達.001 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後續將以此測量模型來考驗理論的結構模型。

三、結構模型的估計結果

為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的影響，本研究假設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會影響個體的提升式希望感，進而影響復原力的效能，依據這個假設建立三個假設模型，並以結構方程式模型來考驗變項間的路徑關係，請參閱圖 1 的理論模型。本研究以 434 位國中學習障礙學生作為觀察樣本，進行模型的建構與評估。

本研究採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statistic test)、均方根近似誤(RMSEA)、適配度指標(GFI)、非正規適配指標(NNFI)、比較適配指標(CFI)、精簡適配度指標(PGFI)、精簡正規化適配指標(PNFI)與穩定的 Akaike 訊息效標(CAIC)等指標作為判斷依據。其中，卡方考驗未達顯著，表示模

型具有良好的適配度，另外則以 RMSEA 指數小於.08、SRMR 指數小於.05、GFI 指數大於.90、NNFI 指數大於.90、CFI 指數大於.90 等數值，作為模型適配的判斷標準(余民寧，2006)。經檢定後，本研究三種不同模型分析結果之相關模型適配度指標值，如表 4 所示。

(一) 模型 A：直接效果模型

模型 A 是一種直接效果模型，本研究根據 Hoyle 與 Smith (1994)的方法，在估計潛在中介變項(提升式希望感)的效果前，需先估計潛在預測變項(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潛在結果變項(復原力)的直接效果，亦即直接效果模型係假定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可對復原力造成直接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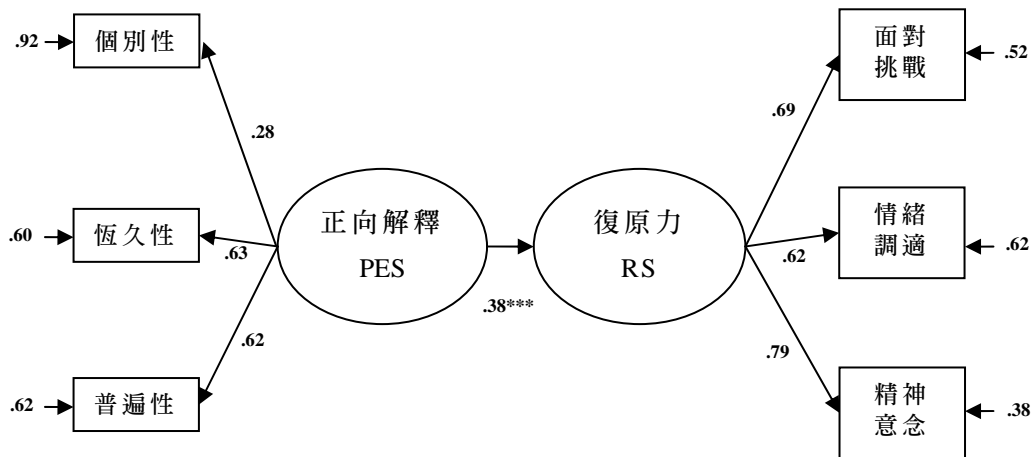
模型 A 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結果如圖 3 所示， $\chi^2 = 3.11$ ， $df = 8$ ， $RMSEA = .000$ ， $p = .93$ ，顯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達良好適配。結果亦顯示在不考慮提升式希望感的情況下，從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直接影響復原力的效果值為.38，*t* 值為 5.09，達.001 顯著水準，表示接續估計中介模型是有意義的。至於本模型中所有標準化數值均達顯著，潛在預測變項「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潛在結果變項「復原力」的解釋變異量(R^2)為.14。

表 4
三種結構模型整體適配度考驗與卡方差異檢定摘要表

模型	χ^2	df	RMSEA	SRMR	GFI	NNFI	CFI	PGFI	PNFI	CAIC
模型 A： 直接效果	3.11	8	.000	.016	1.00	1.02	1.00	.38	.53	95.06
模型 B： 部分中介效果	16.83	17	.000	.025	.99	1.00	1.00	.47	.60	151.21
模型 C： 完全中介效果	19.95	18	.016	.027	.99	1.00	1.00	.49	.63	147.26
模型比較	$\Delta\chi^2$	Δdf								
部分 vs. 完全	3.12**	1								

註：精簡適配度指標 PGFI 值越大越好；PNFI 值越大越好；CAIC 值越小越好。

** $p < .01$



$\chi^2 = 3.11, df = 8, p\text{-value} = .93, RMSEA = .000$

圖 3 模型 A 直接效果模型的結構模型圖 (標準化解)。

(二) 模型 B：部分中介效果模型

根據本研究的理論假設，提升式希望感可能是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的中介變項。模型 B 是一種部分中介效果模型，表示提升式希望感部分中介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亦即部分中介效果

模型係假定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之影響可區分為兩種，其一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之直接影響，其二則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透過提升式希望感（中介變項）對復原力造成的間接影響。

模型 B 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結果如圖 4 所示， $\chi^2 = 16.83$ ， $df = 17$ ， $RMSEA = .000$ ， $p = .47$ ，顯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達良好適配。比較直接效果模型與部分中介效果模型之結果，發現部分中介效果模型中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的直接效果不但由正值轉為負值，且直接效果並未達顯著（直接效果值為-.20， $t = -1.69$ ， $p > .05$ ）。就學理而言，部分中介效果模型成立的條件要求所有徑路上的係數皆須達顯著(James, Mulaik, & Brett, 2006)，因此

就統計上的意義而言，代表提升式希望感似乎並非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的關係中扮演著部分中介的角色，而較傾向於完全中介的角色。至於本模型中僅由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到復原力的直接效果未達顯著，其餘標準化數值則均達顯著，潛在預測變項「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潛在中介變項「提升式希望感」的解釋變異量(R^2)為.41，對潛在結果變項「復原力」的解釋變異量(R^2)則為.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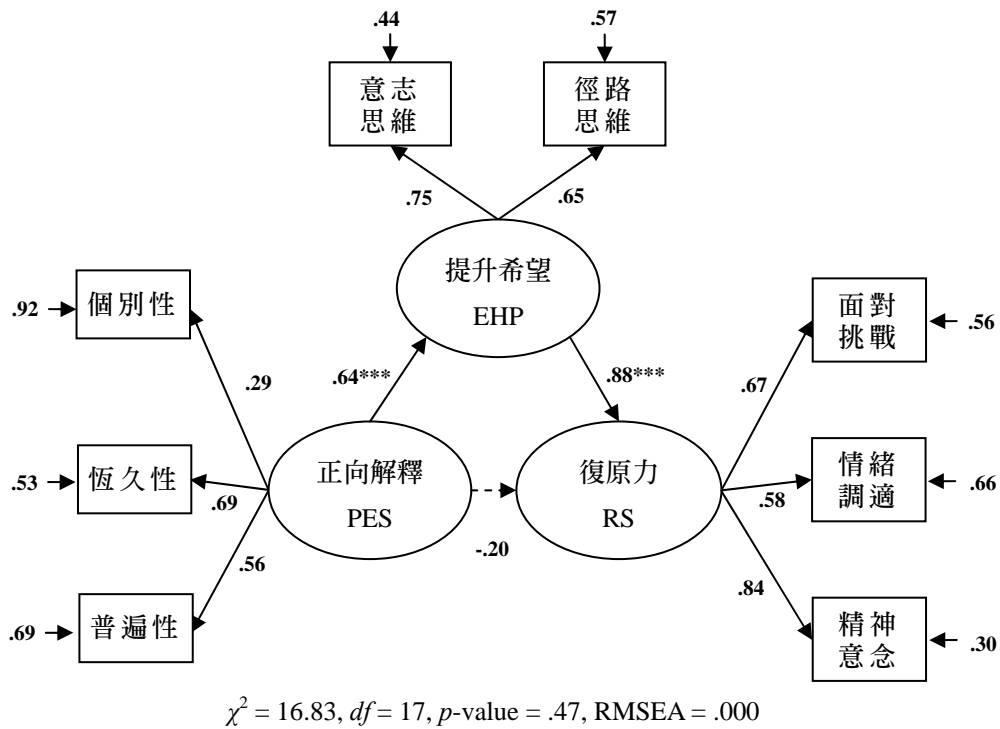


圖 4 模型 B 部分中介效果模型的結構模型圖（標準化解）。

註：圖中的虛線表示由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到復原力的直接效果未達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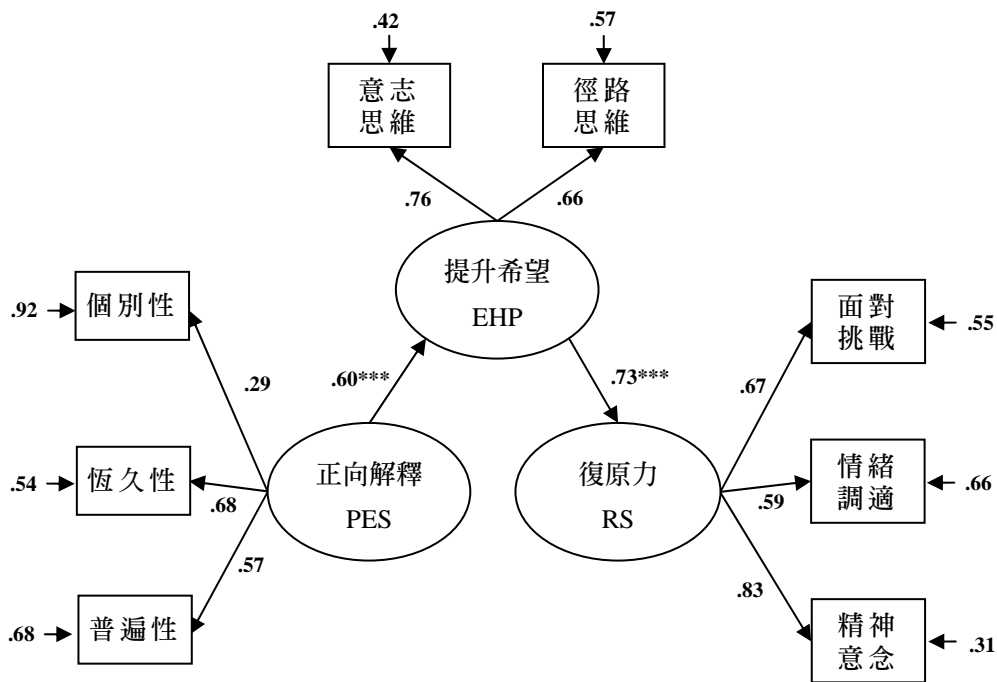
(三) 模型 C：完全中介效果模型

模型 C 是一種完全中介效果模型，係假定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之影響為間接之影響，亦即正向事件解釋風格乃是間接透過提升式希望感進而影響到復原力。與部分中介效果模型相比，在完全中介效果模型之中，研究者去除了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直接影響到復原力之路徑關係，使得完全中介效果模型更為精簡。

模型 C 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結果如圖 5 所示， $\chi^2 = 19.95, df = 18, RMSEA = .016, p = .34$ ，顯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達良好適配。從正向事件解釋風格間接到復原力的效果值為 $.44 (.60 \times .73 = .44)$ ， t 值為 6.83，達 .001 顯著水準，表示提升式希望感在正

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扮演者完全中介變項的角色。至於本模型中所有標準化數值均達顯著，潛在預測變項「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潛在中介變項「提升式希望感」的解釋變異量(R^2)為 .36，對潛在結果變項「復原力」的解釋變異量(R^2)則為 .19。

本研究根據理論假設提升式希望感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扮演著重要的內在心理運作機制，亦即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個體復原力的影響，需透過提升式希望感，才會對個體復原力之效能產生影響。進一步，根據理論基礎與精簡適配度指標值（如表 4 所示），進行模型 B 與模型 C 之比較，顯示完全中介效果模型的



$\chi^2 = 19.95, df = 18, p\text{-value} = .34, RMSEA = .016$

圖 5 模型 C 完全中介效果模型的結構模型圖 (標準化解)。

精簡適配情形較佳。因此本研究總結指出，圖 5 的模型 C（提升式希望感完全中介模型， $\chi^2 = 19.95$ ， $df = 18$ ， $RMSEA = .016$ ， $p = .34$ ）是比較良好適切的模型。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會透過提升式希望感，對復原力產生間接的影響，亦即提升式希望感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扮演著完全中介變項的角色。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茲針對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統計考驗結果，綜合討論如下。

（一）測量模型

本研究自行編製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尚可，但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相對較為偏低。研究者推論可能是因為題目數較少的緣故，其測量工具內容僅試圖瞭解與採用某些具體、易測量的正向事件，但囿於題目數過少則可能未必能完全符合個體的生活經驗，也不能完全反映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此構念的內涵，未來應進一步擴大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測量之範疇。

此外，經參酌之前相關文獻，Abramson、Alloy 與 Metalsky (1989) 以及 Peterson (1991) 的研究結果均發現，解釋風格對於內在原因（個別性）的預測不如對於穩固原因（恆久性）與普遍原因（普遍性）的預測，而 Abramson 等人也據此提出「憂鬱的絕望理論」(the hopelessness theory of depression, HT)，主張解釋風格的恆久性向度和普遍性向度比起個別性向度，對於動機和憂鬱有更強烈的影響，而個別性的歸因並非是關鍵的因素，HT 理論並提出絕望感涉及負向事件的穩定性與普遍性，希

望感則涉及正向事件的穩定性與普遍性。另外，不同於 ASQ 量表內涵採取個別性、恆久性與普遍性三個向度，後續由 Peterson 與 Villanova (1988) 所編製的「擴充版歸因風格問卷」(the Expanded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EASQ) 則嘗試將恆久性與普通性兩個向度合併為「通則性」向度，因此 EASQ 量表的內涵僅包括個別性與通則性兩向度。因此，未來也可進一步審視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的向度內涵，能更提升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此潛在變項的內在品質。

（二）結構模型

1.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於國中學習障礙學生之復原力效能有顯著的預測力

過去某些研究曾指出悲觀解釋風格能預測憂鬱症狀，也就是說憂鬱症狀會隨著悲觀解釋風格而日漸增加(Golin et al., 1981; Seligman et al., 1988)；相反地，也某些研究認為悲觀解釋風格對憂鬱症狀並未具有重大影響(Bennet & Bates, 1995; Tiggemann, Winefield, Winefield, & Goldney, 1991)，而憂鬱症狀則關乎個體復原力效能之展現，顯示悲觀解釋風格對於憂鬱症狀或復原力之影響尚未有定論。本研究採取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結果，則發現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於其復原力效能有顯著的預測力。亦即國中學學習障礙學生在面對好的事件發生時，越傾向認為這件好事情是因為自己本身能力所致（內在化），越傾向認為這件好事情是會持續重複發生的（永久性），以及越傾向認為好事情是會跨情境出現的（一般性），越具備彈性因應與調適壓力與逆境的情緒回復能力。

2. 提升式希望感可能會影響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之負向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部分中介效果模型中，「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直接影響復原力」此路徑在提升式希望感為中介變項的架構下，其直接效果雖然未達顯著，但卻反而由正值轉為負值，亦即在面對正向事件時較為樂觀的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有可能在提升式希望感的運作之下，其樂觀態度卻反而直接造成較差的情緒調適與回復能力，此部分和傳統研究認為樂觀會帶來正向結果，而悲觀會帶來負向結果的觀點相反，仍值得後續深入探討。經參酌相關文獻(Norem, 2002; Norem, & Cantor, 1986; Weinstein, & Klein, 1996)，推究其原因，可能是「防衛型悲觀」或「不務實的樂觀」的作用所產生的結果。防衛型悲觀是一種具有正向益處的負向思維，可以透過擔心失敗的焦慮，轉化為有助於成功的能量(李政賢譯, 2011)，其可以發揮三個正向的功能，包括：(1)先降低期望，如果結果真的不理想，就可以減輕失敗的打擊；(2)預期可能會有最壞的結果，就可以先行思考做好未雨綢繆的準備；(3)不斷想像可能搞砸的各種狀況，然後逐一做好萬全準備，並且將焦慮轉化為建設性的能量(Norem, & Chang, 2002)，因此可能會將負面思考與情緒產生正向的結果，提高成功的機會。至於另一個可能則是不務實樂觀的作用，因為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樂觀解釋風格都是有益的，樂觀解釋風格係具有個別差異與主觀性存在，當樂觀脫離現實太遠，就有可能讓個體未蒙其利而先反受其害，如同Weinstein (1980)的研究指出不務實樂觀可

能會使人顯著低估了個體遭遇日後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因而影響其復原力之運作。

3. 提升式希望感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

過去研究指出正向事件樂觀解釋風格被證實擁有較少的精神病症狀，也與較高動機、生理幸福感與較少沮喪症狀相關；悲觀解釋風格則可能引起無希望感，連帶造成許多沮喪症狀(Abramson et al., 1995; Buchanan, 1995; Jolley et al., 2006; Lakdawalla et al., 2007)。本研究更進一步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為對象，視學習障礙為危險因子，提出一個復原力中介模型的假設，設定正向事件解釋風格需透過提升式希望感為中介變項，進而影響其復原力效能。研究採取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提升式希望感完全中介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在面對正向事件或成功情境時越傾向於內在化、穩定性與一般性歸因的樂觀解釋風格，會使其具備較高的提升式希望感，因而進一步提升其復原力之效能。亦即在面對好的事件時，具備樂觀解釋風格的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會擁有較高的提升式希望感，進而完全透過提升式希望感的影響，提升其情緒調適與復原力效能之展現。綜而言之，本研究之理論模型獲得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實徵資料之支持，亦即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結構模型理論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

感與復原力之關係。具備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的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會具有較高的提升式希望感，進而擁有較高的復原力效能，因此可知提升式希望感在此模式中扮演著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過去的研究，大多僅探討樂觀與希望感之關聯性，指出樂觀的個體也傾向於充滿希望感(Snyder, 2000; Snyder, Rand, & Sigmon, 2002)。另外，也有研究探討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關聯性，包括指出悲觀解釋風格與較差的情緒調適之間具有顯著負相關(Lakdawalla et al., 2007)，以及指出樂觀解釋風格與心理或生理健康有顯著相關，樂觀解釋風格者的沮喪較少，善於處理壓力，且較能有效運用正向因應策略來處理問題，而其生理不舒服症狀也較少(Aspinwall, Richter, & Hoffman III, 2002; Colligan, Offord, Malinchoc, Schulman, & Seligman, 1994; Nes & Segerstrom, 2006; Scheier & Carver, 1993)。然而，對於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在個體內在影響機制的運作過程卻從未提及，因此本研究結果發現提升式希望感的中介效果，已可初步解釋在個體內在機制的運作過程中，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於復原力效能之影響。

根據本研究主要研究結果與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一、對特殊教育實務的建議

(一) 教導學習障礙學生正確的樂觀解釋風格歸因再訓練課程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依照三個向度平均得分之高低排列，依序為正向事件個別性($M = 2.69$)、正向事件恆久性($M = 2.52$)、正向事件普遍性($M = 2.49$)，顯示國中學習

障礙學生的正向事件個別性明顯高於正向事件恆久性與正向事件普遍性。若以四點量表之理論中點 2.50 分為基準，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在「正向事件個別性」向度上較傾向於「內在化」歸因。在「正向事件恆久性」向度上較傾向於「穩定性」歸因，在「正向事件普遍性」向度上則略為傾向於「特定性」歸因，亦即學習障礙學生面對正向事件時較傾向於歸因其只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出現。因此，建議輔導工作者與特殊教育教師應藉由實施歸因再訓練課程來改善學習障礙學生在遭遇成功時的正向事件普遍性解釋風格，引導學習障礙學生能將正向事件視為跨情境均會發生，以協助導正學習障礙學生能具備正向積極歸因之普遍性解釋風格。

(二) 提供學習障礙學生充實意志思維與徑路思維希望之正向課程

本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學習障礙往往被視為是一項危險因子，但提升式希望感越高的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其復原力效能越高，因此提升式希望感可視為國中學習障礙學生面對學習挫折與社交技巧缺陷時激發其復原力效能的一項保護因子，進而建構出學習障礙學生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交織的復原力模型。因此在實務應用方面，為增益與厚植提升式希望感此一保護因子，建議輔導工作者與特殊教育教師應提供學習障礙學生一系列能增進其意志思維之堅持強度，以及促進徑路思維之多元思考的正向心理學課程，並鼓勵學生在面對不確定的情況以角色扮演或在腦中預想方式先進行練習，以增進其意志思維希望與徑路思維希望之效能感，進而發揮復原力效能。

二、對後續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就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所探討的變項包括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三者，但在本研究中並未納入負向事件解釋風格，因此也無法去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負向事件解釋風格之關聯性與歧異性，建議後續研究可考慮納入探討。另外，本研究自編量表的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稍低，可能因為量表題目數過少所致，內容未必能夠完全符合受試者的生活經驗，也不能完全反映三個研究變項構念之內涵，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擴充編製量表題目的量與質。其次，依據 Scheier 與 Carver (1992) 的研究指出天生氣質樂觀／悲觀與解釋風格的相關約為.20，雖兩者應為不同的構念，但因其有相關存在，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天生氣質樂觀／悲觀與解釋風格的關係，可能會更為釐清與擴充樂觀／悲觀理論。最後，有些研究也指出樂觀與悲觀是雙向度（丁明潔，2003；吳相儀、林耀南、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2008），因此建議後續研究或許可將解釋風格區分為樂觀解釋風格與悲觀解釋風格，或許更有助於後續復原力之建構與理論應用。

(二) 就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僅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為正式樣本，研究結果亦僅能類推至類似樣本，建議後續研究可考慮擴充研究對象之範圍，例如將國小、高中職與大專院校等各階段別的學習障礙學生納入，使調查對象的來源較為多樣，反應出更具連續性的觀點，藉此也可比較不同階段別學習障礙學生之差異情形。其次，亦可擴充至不同類別之研究對象，例如將普通學生、資

賦優異學生、視覺障礙、聽覺障礙等各類特殊需求學生納入，可使調查對象的來源反應出更多元化的觀點，並可採取適當統計方法進行跨群體之間的比較，因其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影響與運作可能會有些殊異，應能提升模型的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

(三) 就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係採取調查研究法，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研究取向偏向於量化研究。然而若僅採取量化統計分析，對現實情況之瞭解將囿於研究方法限制而較為侷限，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考慮輔以觀察與訪談，或結合文件分析、人種誌研究及個案研究等偏向質化之研究方法，使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更為深入，以補充量化研究之不足。其次，本研究係屬橫斷性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可採取縱貫性之研究設計，蒐集連續縱貫性資料。若配合縱貫性研究之實施，便可從靜態的橫斷面擴及到動態的縱貫面，此對研究變項間長期、動態關聯性之瞭解將有更多助益。

(四) 就模型驗證方面

本研究因研究正式樣本之限制，並未進行模型穩定(model stability)的驗證，亦即缺乏「複核效化」(cross-validation)之處理，建議後續研究可再抽取一組不同樣本進行複核效化效度評鑑以證明模型之穩定程度。其次，建議後續研究亦應將此達適配的理論模型應用到不同母群體（如普通學生、資賦優異學生）的其他樣本上，進行模型延展(validity extension)等考驗，驗證此模型在不同樣本族群上是否也能達到良好適配，如果此驗證達適配，才能說明

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型亦可推論到其他不同的族群。

(五) 就統計分析方面

針對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相關研究結果，建議後續研究可採取後設分析(meta-analysis)之方法，統整歷年來研究之次級資料結果，針對變項間之相關情形進行分析，據以瞭解變項彼此之間確切的相關性。其次，本研究之變項僅針對個體層次進行探究，並未將群體層次納入考量，建議後續研究可將群體層次（如學校希望感）納入模型之中，採取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進行理論模型之個體層次與群體層次的多層次模型分析，並進一步檢測各種理論模型，以更深入分析變項間之關聯性。

參考文獻

- 丁明潔(2003)。《國中生樂觀／悲觀傾向、課業壓力評估、課業壓力因應方式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北市。
- 余民寧(2006)。《潛在變項模式——SIMPLIS的應用》。臺北市：高等教育。
- 余民寧、鍾珮純、陳柏霖、許嘉家、趙珮晴(2011)。教師健康行為、評價性支持與憂鬱傾向之關係：以主觀幸福感為中介變項。《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35，23—48。
-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2年9月28日）。
- 李政賢（譯）(2011)。《正向心理學》(原作者：S. R. Baumbardner & M. K. Crothers)。臺北市：五南。(原著出版年：2009)
- 吳相儀、林耀南、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2008)。樂觀就不悲觀嗎？樂觀與悲觀的雙向度理論驗證及量表的發展。《測驗學刊》，3(55)，559—589。
- 高民凱(2001)。《中學生解釋風格量表之編製及其效度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彰化市。
- 黃致達(2008)。《以希望感理論設計案例討論進行大學生網路成癮之研究——以東華大學生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
- 敬世龍(2010)。《中學生希望感量表發展及相關因素之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 詹雨臻、葉玉珠、彭月茵、葉碧玲(2009)。「青少年復原力量表」之發展。《測驗學刊》，56(4)，491—518。
- 駱月娟、黃曬莉、林以正、黃光國(2010)。盼望的雙元性——新盼望量表之建構及效度檢證。《中華心理學刊》，52(3)，265—285。

- Abramson, L. Y., Alloy, L. B., & Metalsky, G. I. (1989).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358-372.
- Abramson, L. Y., Alloy, L. B., & Metalsky, G. I. (1995).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In G. M. Buchanan & M. E. P. Seligman (Eds.), *Explanatory style* (pp. 113-134).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Abramson, L. Y., Seligman, M. E. P., & Teasdale, J. D. (1978).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 Critique and reform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7*, 49-74.
- Aspinwall, L. G., Richter, L., & Hoffman III, R. R. (2002). Understanding how optimism works: An examination of optimists' adaptive moderation of belief and behavior. In E. C. Chang (Ed.),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217-23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cademic of Marketing Science*, *16*, 74-94.
-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NY: Freeman.
- Bennet, D. S. & Bates, J. E. (1995). Prospective model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arly adolescence: Attributional style, stress and support.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5*, 299-315.
- Blackorby, J. & Wagner, M. (1997). The employment outcomes of youth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review of findings from the NLTS. In P. Gerber & D. Brown (Eds.),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employment* (pp. 57-76). Austin, TX: Pro-Ed.
- Bonanno, G. A. (2004). Loss, trauma, and human resilience: Have we underestimated the human capacity to thrive after extremely aversive ev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 20-28.
- Brown, D. S. & Gerber, P. J. (1994). Employing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P. J. Gerber & H. B. Reiff (Eds.),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adulthood: Persisting problems and evolving issues* (pp. 194-203). Austin, TX: Pro-Ed.
- Bryan, T. (2003).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risk and resilience model to social problems of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ponse to Bernice Wong.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18(2), 94-98.

- Buchanan, G. M. (1995). Explanatory style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G. M. Buchanan & M. E. P. Seligman (Eds.), *Explanatory style* (pp. 225-232). Hillsdale, NJ: Erlbaum.
- Bunce, S. C. & Peterson, C. (1997).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explanatory sty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3, 639-646.
- Christle, C. A., Jolivette, K., & Nelson, C. M. (2000). *Youth aggression and violence: Risk, resilience, and prevention*. Retrieved from <http://eric.ed.gov/?id=ED449632>
- Colligan, R. C., Offord, K. P., Malinchoc, M., Schulman, P., & Seligman, M. E. P. (1994). Caving the MMPI for an Optimism-Pessimism Scale: Seligman's attributional model and the assessment of explanatory styl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0(1), 71-95.
- Connor, K. & Davidson, J. (2003).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Depress Anxiety*, 18, 76-82.
- Cosden, M. (2003). Response to Wong's article.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18(2), 87-89.
- Cosden, M., Brown, C., & Elliott, K. (2002). Development of self-understanding and self-esteem in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B. Y. L. Wong, & M. Donahue (Eds.), *Social dimensions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pp. 33-51). Mahwah, NJ: Erlbaum.
- Cropley, M. & MacLeod, A. K. (2003). Dysphoria, attributional reasoning and future event probability.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10(4), 220-227.
- Dohrn, E. & Bryan, T. (1998). Coaching parents to use causal attributions and task strategies when reading with their children.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9(2), 33-46.
- Dyer, J. G. & McGuinness, T. M. (1996). Resilienc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10(5), 276-282.
- Elliott, J., Knight, A., & Cowley, C. (1997). *Oxfor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 39-50.
- Golin, S., Sweeney, P. D., & Schaeffer, D. E. (1981). The causality of causal attributions in depression: A cross-lagged panel correla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0, 14-22.
- Grotberg, E. H. (1995). *The international project: Promoting resilience in children*. Retrieved from <http://eric.ed.gov/?id=ED383424>
- Grotberg, E. H. (2001). Resilience program for children in disaster. *Ambulatory Child Health*, 7(2), 75-83.
- Hagen, K. A., Myers, B. J., & Mackintosh, V. H. (2005). Hope, social support,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at-risk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5(2), 211-219.
- Ho, S. M. Y., Chu, K. W., & Yiu, J. (2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anatory styl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fter bereavement in a non-clinical sample. *Death Studies*, 32, 461-478.
- Hoyle, R. H. & Smith, G. T. (1994). Formulating clinical research hypotheses a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 conceptual overview.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2(3), 429-440.
- James, L. R., Mulaik, S. A., & Brett, J. M. (2006). A tale of two method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9(2), 233-244.
- Jolley, S., Garety, P., Bebbington, P., Dunn, G., Freeman, D., Kuipers, E.,...Hemsley, D. (2006). Attributional style in psychosis: The role of affect and belief typ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 1597-1607.
- Kamen, L. P. & Seligman, M. E. P. (1987). Explanatory style and health. *Current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Reviews*, 6, 207-218.
- Kashdan, T. B., Pelham, W. E., Lang, A. R., Hoza, B., Jacob, R. G., Jennings J. R.,...Gnagy, E. M. (2002). Hope and optimism as human strength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externalizing disorders: Stres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1, 441-468.
- Keogh, B. (2000). Risk, families, and schools. *Focus on Exceptional Children*, 33(4), 1-11.
- Keogh, B. K. & Weisner, T. (1993). An ecocultural perspective on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children's devel-

- opment: Implications for learning disabilities.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8, 3-10.
- Kivimaki, M., Vahtera, J., Elovainio, M., Helenius, H., Singh-Manoux, A., & Pentti, J. (2005). Optimism and pessimism as predictors of change in health after death or onset of severe illness in family. *Health Psychology*, 24, 413-421.
- Kwon, P. (2002). Hope, defence mechanisms, and adjustment: Implications for false hope and defensive hopeless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0, 207-231.
- Lakdawalla, Z., Hankin, B. L., & Mermelstein, R. (2007). Cognitive theories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conceptual and quantitative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0, 1-24.
- Lerner, J. (2003). *Learning disabilities*.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Lopez, S. J., Snyder C. R., & Pedrotti, J. T. (2003). Hope: Many definitions, many measures. In S. J. Lopez & C. R. Snyder (Ed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handbook of models and measures* (pp. 91-10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Luthans, F., Avolio, B., Avey, J., & Norman, S. (2007).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60(3), 541-572.
- Luthans, F., Luthans, K., & Luthans, B. (2004).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Going beyond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Business Horizons*, 47(1), 45-50.
- Luthans, F. & Youssef, C. M. (2007). Emerging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Management*, 33, 321-349.
- Luthans, F., Youssef, C. M., & Avolio, B. J. (2007). *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ing the human competitive edg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 Luther, S. S., Cicchetti, D., &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3), 543-562.
- Margalit, M. (2003). Resilience model among individual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Proximal and distal influences.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18, 82-86.
- Margalit, M. & Al-Yagon, M. (2002). The loneliness experience of children with

-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B. Y. L. Wong & M. Donahue (Eds.), *Social dimensions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pp. 53-75). Mahwah, NJ: Erlbaum.
- Masten, A. S. (2001). Resilience i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Successful adaptation despite risk and adversity. In M. C. Wang & E. W. Gordon (Eds.), *Educational resilience in inner-city Americ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p. 3-2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Meltzer, L. J., Reddy, R., Pollica, L. S., Roditi, B., Sayer, J., & Theokas, C. (2004).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f-perceptions: Is there a cycl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effort, strategy us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19*(1), 33-44.
- Mezulis, A. H., Abramson, L. Y., Hyde, J. S., & Hankin, B. L. (2004). Is there a universal positivity bias in attribu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self-serving attributional bias. *Psychol Bull, 130*(5), 711-747.
- Miller, L. (2002). Adolesc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Psychic structures that are not conducive to learn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therapy, 28*(1), 29-39.
- Miller, M. & Fritz, M. F. (1998). A demonstration of resilience. *Intervention in School and Clinic, 33*, 265-271.
- Morrison, G. M. & Cosden, M. A. (1997). Risk, resilience, and adjustment of individual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earning Disability Quarterly, 20*, 43-60.
- Nes, L. S. & Segerstrom, S. C. (2006).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cop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 235-251.
- Norem, J. K. (2002). *The positiv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Norem, J. K. & Chang, E. C. (1997).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negative thinking.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9), 993-1001.
- Norem, J. K. & Chang, E. C. (2002).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of negative thinking.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 993-1001.
- Norem, J. K. & Cantor, N. (1986). Defensive pessimism: Harnessing anxiety as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208-1217.
- Park, C. L. & Helgeson, V. S. (2006). Growth following highly stressful life

- event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4, 791-796.
- Peterson, C. (1988). Explanatory style as a risk factor for illnes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2, 119-132.
- Peterson, C. (1991). On shortening the expanded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6, 179-183.
- Peterson, C. (2000). The future of optim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44-55.
- Peterson, C., Buchanan, G. M., & Seligman, M. E. P. (1995). Explanatory styl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field. In G. M. Buchanan & M. E. P. Seligman (Eds.), *Explanatory style* (pp.1-2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Peterson, C. & Park C. (1998). Learned helplessness and explanatory style. In D. F. Barone, M. Hersen, & V. B. Van Hasselt (Eds.), *Advanced personality* (pp. 287-310). New York, NY: Plenum.
-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P. (1984). Causal explanations a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 Theory and evid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91(3), 347-374.
- Peterson, C., Semmel, A., Baeyer, C., Abramson, L. Y., Metalsky, G. I., & Seligman, M. E. P. (1982). The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6(3), 287-300.
- Peterson, C. & Steen, T. A. (2002). Optimistic explanatory style. In C. R. Snyder & J. L. Shane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244-25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on, C. & Villanova, P. (1988). An expanded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 87-89.
- Pintrich, P. & Schunk, D. (2002). *Motivation in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Merrill.
- Scheier, M. F. & Carver, C. S. (1992). Effects of optimism 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Theoretical overview and empirical update.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6, 201-228.
- Scheier, M. F. & Carver, C. S. (1993). On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The benefits of being optimistic.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 26-30.
- Schneider, S. (2001). In search of realistic optimism: Meaning, knowledge, and

- warm fuzzin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50-263.
- Seligman, M. E. P. (1995). *The optimistic child*.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Seligman, M. E. P. (1998). *Learned optimism: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 New York, NY: Pocket Books.
- Seligman, M. E. P., Abramson, L. Y., Semmel, A., & von Baeyer, C. V. (1979). Depressive attributional styl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8, 242-247.
- Seligman, M. E. P., Castellon, C., Cacciola, J., Schulman, P., Luborsky, L., Olloven M., & Downing, R. (1988). Explanatory style change during cognitive therapy for unipola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 13-18.
- Seligman, M. E. P. & Csikszentmihalyi, M. (2000).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5-14.
- Seligman, M. E. P., Nolen-Hoeksema, S., Thornton, K. M., & Thornton, N. (1990). Explanatory style as a mechanism of disappointing athletic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 143-146.
- Seligman, M. E. P., Peterson C., Kaslow, N. J., Tanenbaum, R. L., Alloy, L. B., & Abramson, L. Y. (1984). Attributional styl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ldre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3(2), 235-238.
- Shang, T. C. (1994).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an instrument of hope: The hope indicator questionnaire.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56(5), 2935-2946.
- Snyder, C. R. (1994).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Snyder, C. R. (1995). 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nurturing hop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3, 355-360.
- Snyder, C. R. (2000). Hypothesis: There is hope. In C. R. Snyder (Ed.), *Handbook of hope: The theory, measure, and application* (pp. 3-21).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 Snyder, C. R. (2002). Hope theory: Rainbows in the mind. *Psychological Inquiry*, 13(4), 249-275.
- Snyder, C. R., Harris, C., Anderson, J. R., Holleran, S. A., Irving, L. M., Sigmon, S. T.,...Harney, P. (1991). The will and the way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 of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easure of ho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570-585.
- Snyder, C. R., Hoza, B., Pelham, W. E., Rapoff, M., Ware, L., Danovsky, M.,...Stahl, K. J. (1997).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ldren's Hope Scale.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22(3), 399-421.
- Snyder, C. R., Rand, K. L., & Sigmon, D. R. (2002). Hope theory: A member of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family. In C. R. Snyder & S. 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257-27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C. R., Shorey, H. S., & Berg, C. (2004). Hope: The imperative human motive. In W. E. Craighead & C. B. Nemeroff (Eds.), *The concise Corsini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 (pp. 440-441). Hoboken, NJ: Wiley.
- Sorensen, L. G., Forbes, P. W., Bernstein, J. H., Weiler, M. D., Mitchell, W. M., & Waber, D. P. (2003).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over a two-year period in children referred for learning problems: Risk,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18(1), 10-24.
- Spekman, N. J., Goldberg, R. J., & Herman, K. L. (1993). An exploration of risk and resilience i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8, 11-18.
- Spekman, N. J., Herman, K. L., & Vogel, S. A. (1993). An exploration of risk and resilience i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8, 59-65.
- Stark, K. D. & Boswell, J. (2001). *Discussion of the Penn Optimism Program: Recognizing its strength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enhancing the program*. Philadelphia, PA: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 Tiggemann, M., Winefield, A. H., Winefield, H. R., & Goldney, R. D. (1991). The prediction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rom attributional style: A test of the hopelessness model of depress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3, 125-127.
- Tusai, K. & Dyer, J. (2004). Resilience: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construct. *Holistic Nursing Practice*, 18(1), 3-8.
- Weinstein, N. (1980).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 *Journal of*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5), 806-820.
- Weinstein, N. & Klein, W. (1996). Unrealistic optimism: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5(1), 1-8.
- Werner, E. E. (1993a). Risk and resilience in individual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essons learned from Kauai longitudinal study.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8(1), 23-24.
- Werner, E. E. (1993b). Risk,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Perspective from the Kauai longitudinal stud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5(4), 503-515.
- Werner, E. E. & Smith, R. S. (1982). *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silient children and youth*.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Werner, E. E. & Smith, R. S. (1992). *Overcoming the odds: High risk children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erner, E. E. & Smith, R. S. (2001). *Journeys from childhood to midlife: Risk,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estburg, N. G. (2003). Hope, laughter, and humor in residents and staff at an assisted living facility.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25, 16-32.
- Wiener, J. (2003). Resilience and multiple risks: A response to Bernice Wong.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18(2), 77-81.
- Wong, B. Y. L. (2003). General and specific issues for researchers' considerations in applying the risk and resilience framework to the social domain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 Practice*, 18(2), 68-76.

The Verification of Model among Explanatory Style for Good Events, Enhanced Hope, and Resilience: The Example of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Ping-Ruey Wu

Min-Ning Yu

Yi-Wei Hsin

Hsinchu County Chungshiao
Junior High Schoo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iaoli County Dalun
Junior High School

Abstract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earlier studies, this study proposed an “explanatory style for good events, enhanced hope, and resilience model” on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D) in secondary school. This model assumed that the individual’s enhanced hope mediate the link between explanatory style for good events and resilience. A total of 434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LD i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fit between the collected data and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assumed mode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were also proposed.

Key words: explanatory style for good events, resilience, enhanced hop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